

20 世纪中国文学

# 论大跃进民歌运动与“五四”民粹主义思潮的历史勾连

张育仁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47)

[摘要] 民粹主义是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 而大跃进民歌运动毫无疑问的又是构成这种民粹主义的一大浪漫而神魔的重要内容。若从浅表的考察来看, 这场空前(!) 绝后(?) 的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政治哲学动力、以几亿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的全民诗歌大批量生产的运动, 似乎只能称作一种狂躁浪漫的精神闹剧; 但从深层的考察来看, 它就完全不能说是闹剧了, 准确地说这个运动自始至终隐伏着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的诗化哲学的魂灵。

[关键词] 大跃进民歌运动; 民粹主义; 人民公社; 共产主义文学; 诗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6X(2007)05-0021-05

—

毛泽东对农民作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的认识有两个来源: 其一为风靡“五四”前后的民粹主义思潮; 其二为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在 1920 年夏天他逐渐转变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后,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早期情结似乎逐渐淡出以致隐匿了。但是, 当 1958 年民粹主义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民歌运动而复苏蔓延之时, 这一切又从何解释呢? 一种曾被某些学者指认为被“彻底清算”了的近代政治哲学思潮, 又是怎样能重新喷发以致发展到汹涌而不可遏制的势头, 这一切的秘密又何在?

答案既在毛泽东深层的文化性格——在他权威理趣的曲折隐涵之中; 又在中国亿万农民的深层文化性格——在他们古拙悠长的升平梦幻、天然乐生以及粗朴蒙昧的意态之中。

严格地讲, 大跃进民歌运动既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杰作, 又是亿万农民群众对民粹主义抱以空前的呼应与激赏的杰作。它既是领袖文化性格

的某种程度的普及与泛化, 又是亿万农民群众文化性格的某种程度的神化与张扬。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性历史品格的深刻认识与体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 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是在情感的向度上, 还是在经验与理性的累积上, 都使他更卓越更动情地深入到农民的古老文化性格中去, 深入到他们的情感图式和理想图式中去。正因为如此, 他才较“五四”前后所有的新村主义和民粹主义者都更为理智而动情, 更为成熟而急切。

农民群众世代躬耕辛劳,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朴厚善良, 悲苦坚毅。“压迫愈重, 反抗愈烈”, 渴望“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会——而实现土地关系的所有制变革无疑是具其革命文化性格的动力来源。在中国共产党内, 毛泽东是第一个认识与触摸到这个动力源泉的革命家。而农村的田园诗画与农民群众的淳朴勤劳、苦大仇深, 又使毛泽东很容易在将农民视作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同盟军”的时候, 将他们视作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人格化楷模。正因为如此, 他才贸然越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 一步跨入了历史的谬误中。

但这还没有完全接触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奥义核心。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是，前者是以政治经济的体制变革面目大规模展开，后者是以精神文化的浪漫面目大规模进行。这两条主线几乎贯穿了毛泽东数十年来从事农民革命战争的心路历程。即，农民革命要沿着“解放的大道迅跑”，必须要“冲决的网罗”有二：一是政治经济上的阶级压迫，二是精神上的压迫——这当然算不上是民粹主义，但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民粹主义的浪漫与空想之中。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在1958年是怎样与阔别数十年之久的民粹主义重新邂逅的。毛泽东早先提出大搞采风运动是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若单方面从号召各地干部回去负责抓民歌生产来看，尚来能构成完整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要点除了神化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和“共产主义积极性”以外，另一要点就是丑化与作践知识分子。这两点就足以构成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话内容的民粹主义特色。毛泽东在此前一年的1957年3月党的宣传会议上曾愤慨地说道：“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sup>[1]</sup>。考虑到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刺激，因此他的这种忧虑和愤慨是可以理解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固然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对知识分子措词严苛的发端，但成都会议讲话的不同是，他在严厉贬斥知识分子的同时，充分肯定和褒举了农民潜藏的巨大的“共产主义积极性”，同时还为民歌推举到一种神话般的“精神变物质”的高度。毛泽东说：“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即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已经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sup>[2]</sup>。紧接着他充满浪漫情愫与审美期待地谈到他对民歌的特殊感情，谈到大搞全民写诗采风的必要，并进一步提出“中国新诗的出路”。最后他认为读劳动人民创作的“几百万或成千万首的民歌……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杜甫”

在这里只是一种具有特殊指代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它的所指即是“知识分子”。因为毛泽东对李白等诗人是尤为敬重而欣赏的，他之所以将此作比而判其优劣，自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更深隐的哲学思考和道德期待等导致的审美憧憬等缘由。

## 二

“五四”前后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的一大谬误就是在激情呼喊“劳工神圣”、“劳农神圣”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口号的同时，为数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真挚愤懑地诅咒和作践非“劳工化、劳农化”的自己。这种诅咒和作践当然含有情感与理性、文学与革命兼而有之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含有脱胎换骨的渴盼和对平民化人格的崇仰意义。“五四”时期兴感于此的言论颇多，但最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当数陈独秀和李大钊了。陈独秀1920年在《劳动界》上撰文说：“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作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作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有用、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而李大钊则在他的《低级劳动者》一文中愤慨地补充说：“有一种自命为绅士的人说：‘智识阶层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如果说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杰出领袖人物的话已包含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初步领会的意思，那么另一些深受民粹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梦境影响的知识分子则是这样一种深藏原罪感的意态了：“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人？”<sup>[4]</sup>自我诘难、悔痛交迫，其状殊可感人。又如：“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sup>[5]</sup>这种自愧自悔和自虐自责使他们将思想推向极端，并禁不住悲呼：“我们最钦佩的就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sup>[6]</sup>这

较这二人更早的思想家章炳麟曾把当时中国社会分为十六个等级，而第一等级就是农民。他认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种畸形的自损和悲号自有其反传统价值观的进步意义，这种无私无畏的人格价值和理想社会价值追寻最终都归宿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泛劳动主义、民粹主义那里。而这些“五四”知识分子所有过的思想痛楚与情感迷狂，也是毛泽东曾经所深刻经历过的。毛泽东早年曾在《讲堂录》中写道：“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这是他早年文字中对劳动与知行关系的朴素赞美，已明显蕴含着他对农民的真挚敬重，但尚未形成作为一种理想情结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后在漫长而峥嵘的革命战争中，他将民粹主义作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将“五四”时期风行的“到民间去”、“到兵间去”的思想口号作了实事求是的内容更新，并用以教育改造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革命战争服务。实践证明，这是经世致用原则创造的奇迹。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彻底根除和清算民粹主义对他潜意识的干扰。虽然它再次滋生蔓延的时候不再是以“民粹主义”作为思想旗号，但它终究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民歌运动”的时髦装束而叫得震天价响了。这种以贬损知识分子的知识、学问以及智能水平和人格水平为政治文化内容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大跃进中的醒目标举，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比比皆是。如成都会议后两个月，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特别提醒到：“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青年人打倒老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sup>[7]</sup>

这里面明显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包含有呼唤新生，替代陈腐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的社会进化论价值观。但毛泽东的落脚点并不全在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被人看不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最终要“打倒学问多的人”。

将“学问少”与“被人看不起”、“被压迫”的几种价值属性与身份属性并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示的一种历史必然和反价值观的必然，确实是浸润着足够的民粹主义情感理性因素的。一年以后他在庐山上组织批判彭德怀时，仍不忘在发言中以“诗话”的方式来强化和巩固他的这一思

想。他极动情地说：

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

可以想见，这些原本包含辩证法思想的话语，一经误入歧途之后，它们对辩证法的斫伤就是十分惨烈的了。精神产品生产的浮夸风是“共产风”的另一个不可小觑的侧面，它与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的浮夸风一样，越刮越猛。一时间飞沙走石，“新民歌”中不少篇什以争贬知识、学问和轻贱知识份子，谩夸文盲写诗奇迹为浅陋野蛮风习。在此略列一二，以便于析述。

其一：

文盲握笔写诗歌，心头舒畅如大河；  
千年笔尖不说话，今日有话说不完。

其二：

太白斗酒诗百篇，神话流传二千年；  
如今诗歌地连天，愧煞长庚老神仙。

其三：

工农诗歌好又多，赛过杜甫苏东坡；  
过去诗人有几何？如今人人写诗歌。

以“李白”、“杜甫”、“苏东坡”作为揶揄对象的新民歌比比皆是。当然断不可认为这些“新民歌”的创作者真正打心眼里在蔑视和糟贱以上这些大诗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新民歌是既要讲数量的“浮夸”，又要讲内容的“浮夸”的。所以，流风所及，知识和知识分子都真的是无地自容了。这自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民粹主义革命化的盖世神功所创造的奇迹。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因知识和学问带来的诸多优越感迅速跌价为卑微感和忏悔意识。面对铺天盖地的“新民歌”，他们中不少卓有成就的诗人不惜降低自己的写作水准去重新学习写诗，重新在大跃进和大民公社化运动中去检讨自己，改造自己“发现自己”。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真诚而痛苦的——邯郸学步，充满悲喜剧意味。

请先看一位著名诗人的《十三陵水库工地杂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的内容，“姓曹的将军”是指梁朝的曹景宗。文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讲话汇编》1990版，第311页。以上所引民歌均见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第35页、第67页。

诗》:

奔水库先投入海  
奔山口蓝潮汹涌!  
叫四山环抱我骨头,

从此排千陵万陵!  
自然有规律, 缺头脑,  
什么主义也不管,  
别抱怨“天地不仁”,  
我们造锦绣河山!

意象纷乱, 韵律全无, 理念先行, 诗意阙如。这确是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这样的诗与生动形象、押韵耐唱的“新民歌”相较, 硬是要“愧煞长庚老神仙”了。民粹主义就是如此使知识分子在原有价值秩序失范和理想追寻迷乱的同时窘态毕现、斯文扫地。

再看另两位著名诗人的由衷感喟。柯仲平说:“我感到很多的民歌都来向我挑战, 那许多新民歌摆在我而前, 就像一种挑战书, 我不能不写, 不能不应战”<sup>[8]</sup>; 而郭小川则更以一种忏悔者的激情说:“谁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呢?新民歌向新诗发起了一次极严重的挑战:你, 新诗!你, 社会主义的诗人!你们要发展, 要长进吗?你们再不能无视我了。”<sup>[9]</sup>岂止“不能无视”——对“新民歌”的学习态度、认识态度已扩大为检验“知识分子诗人”的政治伦理观标尺和艺术审美标尺。以致一场为历史记忆最为深刻的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的学术公案, 在诗人和批评家诚惶诚恐的争论中, 被党内作家李亚群一语点了个透心凉:“关于形式问题的争论, 还是一个谁跟谁走的问题……关于谁是主流之争, 实质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上争正统, 争领导权的问题。”<sup>[10]</sup>联系到后来的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所说的一段话, 李亚群的这个裁决就不再是唐突的了——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一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因此, 跟“新民歌”走与跟“新诗”走(新诗即所谓“自由诗”)意味就大为不同了。不是吗?毛泽东刚在成都会议上诙谐而不失严肃地表示了他对“新诗”的政治审美态度——“现在的新诗不成形, 没有人读, 我反正不

读新诗, 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至于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诗人”纷纷起身为“五四”以来的新诗寻找可供“检讨”的“缺陷”的负罪局面, 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一段反省:“‘五四’以来的新诗, ……虽然摆脱了旧中国旧诗的规律, 却套上了西洋的枷锁。”<sup>[11]</sup>而傅东华先生干脆说:“将来的诗歌要去吸收外国的东西, 也是直接吸收, 断然不会去继承‘五四’以来四十年的新诗传统”<sup>[12]</sup>, 这就将“新诗”与“新民歌”的关系置为了不可协调、渡让、整合、传接的对立关系了, 这当然并非毛泽东的本意, 但追根溯源, 却又与毛泽东1958年的政治文化战略确是有着深刻联系的。

### 三

与此同时,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和农民“共产主义智慧品格”的极致称颂, 作为民粹主义的另一个侧面, 在大跃进民歌中比重尤大。而“新民歌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这种结论, 也顺理成章出现在周扬的讲话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中。

新民歌是这样来描述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的诗意连接的:“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登上天梯上天堂, 天堂幸福无限量。”<sup>[13]</sup>而那亿万刚脱离小生产私有制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又是怎样来描画共产主义的呢?同样有新民歌为证:“总路线是灯塔, 共产主义开了花, 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工业化……麦克风前来讲话。”<sup>[14]</sup>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遍及全国的浮夸风被《人民日报》专论认为是“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 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 再加上冲天的干劲, 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sup>[15]</sup>现实是什么呢?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考察的干部写的一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信中, 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向人们介绍了一个据说十分寻常的奇迹:“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 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 这样高的指标, 当地干部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诗刊》1958年3月号卞之琳的诗作。

《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另据坐元先生回忆, 他当时还去参观过“万斤大学”, 被其虚构的理直气壮搞得现在仍记忆犹新:“据说这个大学所养的牲口都有万斤重。我那时曾问校长:‘可有万斤鸡?’他断然回答:‘当然有!’我说:‘万斤鸡岂不变成了大象?’他说:‘就是这样!’一点也不觉得说大话的可笑。”详见《在语词的密林里》, 三联书店1992年版, 第190页。

与新民歌气魄相较这尚算不得大。新民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诗歌艺术可以允许夸张虚构的创作优势,在纸面上和口头上生产钢铁、粮食,甚至预支共产主义!如河北束鹿县有一首民歌写道:“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至于夸张描画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是如何大得无法想象的“诗意”比比皆是,泛滥成灾……

毛泽东抑止不住内心的愉悦,一种在青年时曾被放逐了的新村主义和民粹主义激情使他在郑州会议上称誉三国时期张鲁农民政权的“那种社会主义作风”之后,在武昌重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又随手写下一段即兴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例。大约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了。<sup>[16]</sup>

先是称道张鲁政权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继而又详述其“群众性医疗运动”和“吃饭不要钱”均为人民公社先例,究其实质还是在称誉农民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能”;这是实现新社会、新人格的前提和原始依据。正是在这种既新且旧的民粹主义意义上,新民歌运动才被极致地推举神化为在这个运动中人们可以看到未来共产主义文艺的规模。这是“共产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反映大跃进中人民的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风格。”<sup>[17]</sup>几乎所有的关于新民歌运动的评析文字中无一例外地将其定性为“共产主义文艺”——这不是民粹主义的泛滥又是什么呢?

由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恰如从分地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同盟军”地位,与主观拔高神话其所谓“共产主义本能”、具有“共产主义积极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由此进一步拔高神话大跃进民歌运动就距离马克思更为遥远了。其中“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去炼钢,去“赶超英美”,是最具民粹主义狂热的一大笑话。所以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道被指斥为右倾的张闻天在他大义凛然的发言中一语道破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浮夸风的要害:

“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

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sup>[18]</sup>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民歌运动都被历史所否定与嘲笑之后,有一首真正承续中国古老的“国风”传统而被历史所珍视的民歌广为人民传颂,这就是彭德怀在荒芜的田园和迷狂的“小高炉”群中采集来的,用以讽谏的真正的朴实无华的民歌。它与那以亿万计数来虚张声势的“新民歌”形成了鲜明的反照和硬朗的抗衡: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很难想象,当一个杰出的政治权威和诗人哲学家执著于某种瑰美的幻象而脱离了坚实的大地之后,他的“诗篇”还能赋予人们真实的感人魅力——民粹主义原本是极富有政治理想诗趣的,但正因为如此它使1958年的中国和中国文学走向了一条铺花的歧路。

#### [参考文献]

- [1][7]建国以来毛泽东讲话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97、233.
- [2][3]毛泽东在1958年[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25.
- [4]教育的错误[J].平民教育第9号,1919-12-06.
- [5]施存统复轶千[N].民国日报,1920-04-16.
- [6]曹靖华.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N].青年,1920-04-04.
- [8][9][13][17]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324、324、86、131-132.
- [10]诗刊社.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76.
- [11][12]诗刊社.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3、111.
- [14]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91.
- [15]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N].人民日报,1958-08-12.
- [16]毛泽东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J].党史研究,1987,(1).
- [18]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A].张闻天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129.

[责任编辑:爱平]  
(下转第30页)

- 社, 1998.
- [7]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A].周扬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430.
- [8]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J].文艺报, 1953,(2).
- [9]邵荃麟.座谈“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发言[J].文艺报, 1958,(6).450.
- [10]杨鼎川.1967: 狂乱的文学年代[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11]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J].红旗, 1967,(1).
- [12]洪子诚.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 1996,(2).

[责任编辑: 爱平]

## Sectarianism, Potential Shadow of the Left- Wing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YUAN Hong- qua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49- 1966) has obviously been influenced by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and art move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is influence, from which the writer finds that sectarianism stems from left-wing literary and art movement. It is sectarianism that leads to the authorship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its initial stage and the critical movement of literary fiel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sectarianism; the Left- wing literary movemen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rmation

(上接第25页)

## On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of Folk Song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ith Populist Trend of Thought during May 4<sup>th</sup> Movement

ZHANG Yu- r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Populism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the movement of folk songs is doubtlessly an important part this Populism. On the surface, the movement of mass producing folk songs is just a kind of spiritual farce filled with mania and romance. However, a deep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ovement will reveal that it is not a farce, but it conceals,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poeticized philosophical soul of Populism and New Villagist Ideal.

Key words: folk song mov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opulism; the people's commune; communist literature; poetic philosophy